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本）

云南小凉山彝族 社会历史调查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 编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民族出版社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本)

云南小凉山彝族 社会历史调查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 编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小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 . —修订本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6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ISBN 978 - 7 - 105 - 08800 - 3

I. 云… II. 中… III. 彝族—民族历史—社会调查—宁南彝族自治县
IV. 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454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mzcb.com>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2.5 字数：33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4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8800 - 3/K · 1657 (汉 82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010 - 64212794；发行部电话：010 - 64211734)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修订编辑委员会

主任：杨圣敏（回族）

副主任：王建民

成员：（姓氏笔画排序）

丁 宏（回族）

王建民

方 铁

李晓斌（白族）

吴福环

张 跃

潘守永

潘守永

马 戎（回族）

王希隆

白振声（满族）

许宪隆（回族）

苏发祥（藏族）

揣振宇

马建钊（回族）

王文长

李绍明（土家族）

曲庆彪

杨圣敏（回族）

黄有福（朝鲜族）

办公室：潘守永（兼）

徐姗姗（回族）

黄镇邦（布依族）

王剑利

陈雨蕉

莫晓波（瑶族）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总修订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德洙（朝鲜族）

副主任：吴仕民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春（回族）

石玉刚（苗族）

刘明哲（黎族）

贡保甲（藏族）

李明金（苗族）

杨志杰（回族）

张宝岩

陈乐齐（侗族）

罗黎明（壮族）

钟小毛（畲族）

舒 展（满族）

谭建祥（土家族）

陈改户

马玉芬（回族）

曲 伟

刘宝明（彝族）

李文亮

杨丰陌（满族）

肖晓军

阿迪雅（蒙古族）

武翠英

赵学义（满族）

禹宾熙（朝鲜族）

谢玉杰

铁木尔（蒙古族）

王德靖（土家族）

刘志勇

孙宏开

李秀英（瑶族）

杨圣敏（回族）

张忠孝（回族）

陈 理（土家族）

罗布江村（藏族）

胡祥华（土家族）

贺忠德（锡伯族）

雷振扬

办公室主任：陈乐齐（兼）

副 主 任：朴永日（朝鲜族）

成 员：李锡娟

丁 薜

孙国明（蒙古族）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修订再版总序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包括《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记录了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从起源至 21 世纪初的历史发展进程，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荟萃了大量原始的、鲜活的、极其珍贵的资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丛书，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重大项目和重大出版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 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 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 1958 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 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79 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共计 402 本，一亿多字，该项目自 1958 年启动至 1991 年基本完成，历时 30 多年，涉及全国 19 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 400 多个编写组，1760 多人参与，分别由全国 30 多家出版社出版。纵观历史，像这样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编辑出版介绍各个少数民族的丛书在中国前所未有；横看世界，像这样由政府部门组织为国内各少数民族著书立说实属罕见。

盛世修史、修志，这是中国的传统。由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出版时间长，涉及地区广，出版单位分散以及受当时环境条件局限，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体例版本不统一；二是有些解释不准确；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为适应民族工作发展和民族问题研究的需要，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国家民委决定从2005年开始对《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进行修订再版。

这次修订再版的总体原则是“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本，增加新内容”，统一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

《中国少数民族》的修订，旨在原版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结构，更新有关数据和资料，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增加各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的发展成就。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修订，本着“适当修订、适量续修”的原则，对有明显错误的内容、观点、表述进行更正，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史实予以补充。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修订，力求更加全面系统地反映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社会的基本情况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成就和经验，新编1987年以后成立的16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概况。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修订，旨在改错，增补新的研究成果，增写《满族语言简志》，并合订为6卷本。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修订，主要是尊重史实，修正错误，增加注释。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修订再版工作，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各有关地方的高度重视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央党校、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民研所、云南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哈尔滨学院、吉林民研所、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广西博物馆、广西民研所、甘肃省委党校、凉山大学、中国教育部语工委、云南语工委等单位的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的专家学者以及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共1000余人积极参与了修订工作，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修订再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将以更全面、更完整、更科学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李德洙

2007年8月

出版说明

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有24个少数民族，尚有一些未定族体的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3，分布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2/3以上。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地理条件，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呈现历史发展阶段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工作的开展，民族调查研究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1950年至1955年，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对全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党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系统的科学依据。与此同时，对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调查。1956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云南省有关部门配合下，对云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1958年，为配合编写各族简史和简志，继续进行了各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在历次调查期间曾得到各族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经过历次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大量的民族社会调查资料。现有的调查资料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价值，它们涉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民族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许多重要领域。

由于“左”倾思想以及林彪、“四人帮”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干扰和破坏，致使云南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长期无法公开出版。现在为了适应民族地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民族理论研究，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将新中国成立后历年对云南各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前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分别编辑成册，陆续出版。

《丛刊》是研究民族历史、民族学等学科的综合性调查资料汇编。我们这次编选基本上以过去调查整理稿为基础，以便保证调查资料的客观性。在具体编选时，则以具有科学价值作为选编资料的标准，在时间上以反映各民族民主改革前社会面貌的资料为主。根据调查资料的价值大小，采取全录或节录。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由于调查和整理于不同的时间，因此许多调查资料不能不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许多当时调查整理者现在又分散在省内外的不同单位，本职工作任务重，无法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现在参与每种《丛刊》编辑的人手不多，加之编辑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

修订再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内容包括了20世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等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区陆续分别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共有84种145本。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问世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各方面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历史调查资料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国家民委决定修订、再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并将其列为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

本次修订再版，在尊重史实，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式的总原则下，主要是订正错误，并以修订注释的形式增补新的人口数据和地方行政隶属的变化情况。另外，原书中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因无资料可查核，部分只能保持原貌，仅供参考。《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牧区社会历史调查》不再单独出版。新增《吉林省朝鲜族社会历史调查》、《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海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4本。修订本合计为86种147本。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修订再版工作，得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的重视和关心，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广东民族研究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对关心、支持修订再版工作的各级领导、有关部门、专家学者以及所有热心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2007年12月

目 录

云南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	(1)
一、四川大凉山彝族的迁入和发展	(1)
二、新中国成立前小凉山彝族的社会面貌	(8)
三、从小凉山彝族奴隶制发展中看到的几个问题	(21)
宁蒗彝族自治县跑马坪乡彝族社会经济调查	(25)
一、历史简述	(25)
二、生产关系	(29)
三、家支制度与习惯法	(47)
四、生产力发展水平	(51)
五、风俗习惯	(55)
宁蒗彝族自治县沙力坪乡彝族社会经济典型调查	(62)
引 言	(62)
一、等级与家支	(66)
二、黑彝奴隶主补约务哈占有娃子和土地状况	(76)
三、曲诺阿鲁家等占有娃子和土地状况	(90)
四、阿加和呷西的社会经济地位	(102)
宁蒗彝族自治县红桥区石福山乡彝族社会调查	(107)
一、一般情况	(107)
二、社会生产力	(108)
三、等级与等级关系	(114)
四、土地关系	(124)
五、家支情况	(129)
永胜县羊坪公社麦架坪等村彝族民主改革前社会历史调查	(172)
一、前言	(172)
二、生产力简介	(174)
三、生产关系	(176)
四、结语	(185)
后 记	(187)
修订后记	(188)

云南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

调查整理：杜玉亭

一、四川大凉山彝族的迁入和发展

云南的小凉山，一般是指以宁南彝族自治县为主，包括永胜、华坪等县毗邻宁南的彝族聚居区。在有关这一地区的文献记载中，并未见有“小凉山”之类的山川字样，更未见有这一名称的由来的文字。只是从此地居民的传说中得知，这里的彝族是近一二百年来由四川大凉山迁入的，所以人们习惯称这些彝族居住的山区为“凉山”；或因将其与四川大凉山区别之故，一般又称这一地区为“小凉山”。从小凉山这一名称的由来也可以看出，云南小凉山与四川的大凉山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

在小凉山的彝族中，至今还有许多自四川向云南迁徙的传说，而传说的主题，多与反对“利利兹莫”（居治凉山的一个彝族大土司）有关。据说在距今13代前，大凉山爆发了以曲涅系统的子孙阿宜楚皮为首的反对土司的斗争，那时候，今天小凉山的彝族的先人亦曾积极参与其间。据说今刘家（热可家）的祖先阿宜一车即是反土司的首领阿宜楚皮的弟弟，也是那次反土司斗争中的人物。据彝族记忆的家谱计算，这次斗争至今已有13代，每代以25年计，此一传说中的事件至今已有300年左右，其时大概在清初。这次斗争的结果，利利土司失败，由凉山腹地退居边沿地区，其对黑彝的种种剥削和统治自然也就随之取消。但随着土司的失败，凉山内部又产生了黑彝之间纷繁的械斗。其中，有为瓜分土司的土地、百姓等财产不公而发生的械斗，也有因宿冤未解而进行的斗争，据说这种无休无止的械斗连续打了数十年。在这一斗争中，弱肉强食，胜利者的势力更加扩大，而失败者则濒于危亡的境地。那些斗争中的失败者为了免于灭亡，便不得不离开故土，向外迁徙。这就是一般传说中的云南小凉山彝族由来的历史背景。既然外迁的彝族是械斗中的败者，所以这些黑彝家支便不是大凉山中的势力强大者。有些黑彝虽然也是大凉山的大家支（如瓦渣、罗洪家），但外迁者又多是不同分支或本家支间斗争中的弱者，也是因难以立足大凉山而外迁的。

在今川、滇大小凉山的彝族中，作为贵族的黑彝，据说都是古侯、曲涅这两位远祖的后代。至今居住在云南小凉山的黑彝共有余、张、胡、米、刘等5家，他们都是曲涅的后代。余家，彝称补约家，这部分彝族来得较早，已有七八代，不到200年的历史（因其第一代来者已是成年，而末代黑彝尚年幼，故应减去一代）；张家，彝称瓦渣家；胡家，彝称罗洪家；米家，彝称倮姆家；刘家，彝称热可家，这4家来云南已有四五代左右，大约100年左

右的时间。从目前几家彝族迁居云南的时间看，皆未超过 200 年。但是，除前述曲涅的 5 支子孙外，古侯系统的子孙亦曾在云南小凉山居住过，其中著名者是马家，此外还有且吉、别戛等家。据说这些人迁居小凉山比曲涅系统的家支早，而且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过优势，自然也与曲涅系统的家支展开过斗争，但是他们在斗争中逐渐居于劣势，并在今 30 年前最终败退到四川盐边、盐源，所以今天云南的小凉山已没有古侯系统的家支。这一史实说明，古侯系统的后人迁居云南还可能早一些，其迁居原因也由黑彝之间的械斗所引起，其辗转迁移至云南小凉山，当亦应在距今 200 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

在当地汉、纳西（即此地自称之“摩梭”）等族中还盛传“黑彝保厂”的故事。据说清道光年间白牛银厂（即东升厂）兴旺，但社会不宁，于是厂主们便请来了四川盐源的大黑彝武装来保护。又据清末自永胜迁居大村街（今宁蒗县治）的汉族冯厥修老先生说，道光年间黑彝来保厂时宁蒗地区才有彝族，那时来保厂者只有 6 户黑彝和他们带来的数十户“百姓”（娃子）。至今老人们还记得，数十年前白牛厂上还有一个“矿王菩萨”的庙，此菩萨披毡跣足，巨大的包头帕上还伸出一个尖结，手执矿石一块，据说此神即是“罗罗人”（凉山彝族称此神像为“诺苏不兹”，即“彝族泥菩萨”之意）。又有人说，此人是白牛银矿的发现者。由此可见，小凉山彝族在云南的发展可能与道光年间兴办的白牛银厂有关系。从这些各族的传说来看，小凉山彝族迁来的时间亦不过 200 年左右。

关于大凉山彝族迁居云南小凉山的历史记录绝少，但从一点零星的文字中也可证明，以上有关彝族迁入云南的传说，基本上是与史实符合的。如在清乾隆《永北府志》中，就没有有关凉山黑彝的记载，而在清末光绪年间的《永北直隶厅志》卷二十五土司志蒗蕖土司属民中，就有了如下记载：

“黑彝一种，生于冷山寒谷之中，居于深箐峻岭之上，性情顽野，好食生物，身穿褐布，背披长毡，男则编竹篾以赴市，女则卖洋芋以营生，其强健者以抢劫为业，以偷盗为乐，婚配皆通媒妁，以牛羊为聘，死则火化，置之深山，不许人知。”在小凉山地区有关的方志记载里，200 多年前的乾隆时代还没有“黑彝”的文字记载，但在清末的光绪年间，黑彝已经在蒗蕖土司区繁衍发展起来，所以在方志中也就得到了一定地位。

早在元代，即大凉山彝族迁居云南的四五百年前，小凉山已属于封建王朝设立的土司的统治地区，这里的土司和其他地区的土司一样，是世袭的管土管民的统治者。土司之下有一套严密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制度，属下的百姓类似农奴，他们世代耕种着土司的土地，按例向土司纳租服役。显然，这里的土司制度下存在的是封建农奴制度。凉山黑彝及其所属娃子迁居到云南，主要是居住在永北厅所属的蒗蕖土司地区。此外，在永北章土司地区、高土司地区以及羊坪土千总（今属永胜）地区、永宁土司地区，亦先后有凉山彝族迁入。

为了进一步说明凉山彝族在云南的发展，以下有必要对以上土司所辖的属民的族系加以简单介绍。根据有关方志记载，蒗蕖土司的属民是麽麼（纳西族）、西番（普米族）、伯夷（傣族，今宁蒗县尚有少数傣族）。又据人们传说，在土司所在的新营盘过去还有“伯夷花园”；永宁土司辖区属民是麽麼、西番；北胜州高土司属下有僰人（当为白族）、伯夷、劳步（傈僳族）、傈僳（彝族）、西番；北胜州章土司属下有西番、麽麼、劳步；羊坪土千总的属民是麽麼、西番、傈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四川大凉山彝族迁入以前，小凉山地区有无彝族居住的问题。如果向小凉山彝族提出此问题，他们多说在此以前这里没有彝族，然其所指的彝族是以凉山奴隶制的彝族标准来衡量的，所以其他彝族就未在其列了。其实，很

久以来今小凉山地区就有彝族居住了，如地居蒗蕖土司腹心的“罗罗关”，也是因彝族居住过而得名，而此名称早在乾隆《永北府志》中即见于记载，可见早在凉山彝族至此以前这里已有彝族。关于这一点，不少彝族老人还传说，“罗罗关”之下曾经住过一种“水田罗罗”（亦称沙罗罗），因此地庄稼不好，他们在百余年前迁至永胜。再如西川区的“罗罗村”，据说也是因为“水田罗罗”曾居住过而得名。可见早在凉山彝族迁至云南以前，小凉山地区已有彝族居住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汉族和回族早已居住在小凉山地区的问题。关于汉族迁入蒗蕖土司地区的时间，一般都说在道光年间。那时白牛银厂兴旺，大批汉族人民被招募于此。后清末银厂停办，汉族都大批落户此地。但据许多遗存的汉族墓志看来，有不少是属于清代嘉庆年间立石者，可见早在道光年间以前，汉族人民已入居蒗蕖土司地区。与此同时或更早一些的时间，不少回族也已迁入蒗蕖土司地区，至今许多地方还遗有“回子坟”，在宁利区甘沟还有“回子山”，据说这一带的回族比汉族来得还要早。汉族和回族迁到蒗蕖土司区为主的小凉山一带之后，逐渐繁衍生息，几乎凡是可能耕种稻子的一点小河谷，都被他们开发了出来。据说有名的绵绵村一带的大米，就是汉族来后才种植的。汉族和回族迁入今小凉山地区，对这里的生产发展是有一定推动作用的。

以蒗蕖土司地区为主的小凉山地区，除了白渠坝、八耳桥坝和永宁坝等几个山间盆地和拉鹿河、蝉战河等十几个狭小的河谷区以外，基本上都是高山地区。从有关方志记录和当地各族人民的传说得知，这一带地区历来都是山多地广、人口稀疏，除了几个小坝区、河谷区和少数山间缓坡地区外（即今可种苞谷和水稻地区），其他广阔的山区还没有人居住和耕种。有些著名的高山平坝也没有用于农业，如海拔3000多米的牦牛坪，在一百多年前还是蒗蕖土司的牦牛场。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迁来之后，就在这些荒山老林的山区住下来，他们向土司或土司的百姓租过来一片一片的地，按照他们久已熟悉的生产方式砍林烧山，种上了山区可以生长而彝族又擅长种植的荞子和马铃薯，并且得到了较好的收成。就这样，“凉山”一大块一大块地被开辟出来，彝族也就因此而繁盛起来。据老人们估计，至清代末年，小凉山彝族已经发展到两万余人。

彝族迁居到云南之后，同时也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带到这里的山区。他们虽然属于土司统治区内的“客户”，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土司的管束，但他们有自己的居住地区，其社会内部依然实行着原来的奴隶制的等级制度。既然在封建土司统治的山区又同时出现了奴隶制度，而奴隶制的掠夺性质又不能不在附近其他民族地区有所反映，因此在60年前的方志中记载这部分彝族时，就说他们“强健者以抢劫为荣，以偷盗为乐”，可见他们在迁居到土司地区后就已进行着劫掠了。这些记载也和彝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说法一样。据说在三、四十年以前，凉山彝族早已有抢劫活动，但其范围仅限于“偷牛盗马”、“剥衣劫财”之类，并不敢掠夺附近的汉族等人民；即使偶尔有人被掠，土司还有力量在处罚为祸者的情况下索回。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民国十年（1921年）左右，小凉山地区的土司区的大道还是畅通无阻的，彝族都还居于当地土司的统治之下，并且按土司指令在要道上“守哨”。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我们仍可看到土司的余威，不少有名的大黑彝在过年时还要奉上猪头等礼物向土司贺年，而猪头在彝族的传说中正是隶属关系的一种表示。新中国成立前，还有一些黑彝见了土司要叩头。彝族在迁居小凉山时，土司的属地早已划分给当地的“百姓”，一些高寒山区亦不例外。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彝族租种的多是纳西、普米等族（土司百姓）的土地，他们要向出租者交纳地租。甚至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也还有一些彝族（包括黑彝贵

族在内)租种土司百姓的土地,并向这些百姓交租。彝族的畜牧业在当时还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羊的数量不少,因为这些羊吃的是土司土地上的草,所以又有“收草场”的规定,即在一定年限内土司要按彝族的羊只数目征收一定比例的羊。总之,四川彝族迁居云南之后,虽然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社会制度,但他们却是属于当地土司管束的,按彝族老人的话说,40年前他们是“服管又服调”的。

近百年来,国内风云多变,处于云南边远山区的土司统治之下的小凉山彝族,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其中对这里影响最大的首先是清代咸丰年间的“回民起义”。道光年间,有不少汉、回等族人民大量迁居蒗蕖土司区开发银厂,在咸丰年间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中,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据说这里的回族和汉族也曾发生过争斗。回民起义军和清皇朝的军队也曾在这里发生过战争,并且至今人们还记得许多这次战争中的事。据各族老人说,“红白旗闹事”时,情况异常混乱,当时红、白旗两方面的队伍旗鼓相当,对峙了很久。那时小凉山彝族中的一些投机人物就乘机行事,红旗胜时投红旗,白旗胜时投白旗,所以至今还有“一日三投”的遗话。就在当时,一些彝族中的精干人物乘机发展了势力,其中最著名者要算沙力坪的阿鲁基祖。此人幼丧父母,生活贫困,在沙力坪的王姓地主(汉族)家帮工,因其处事干练,得到王家信任,便由赶马人升为管家之类的人物,后因王家子孙软弱无能,财产遂为阿鲁基祖所据。之后在“红白旗事件”时,基祖数次在双方投机,并最终帮助清军击败了起义军,吞没了一大批原来托其庇护的回民的财产,因此还大得地方政府和土司的信任,委其为“千长”;之后他又接受了四川盐边李大把(据说阿鲁基祖原是李的私生子)千长的财产,因而一跃而成小凉山的巨富。他又用重金买了土司的“红照”,占有了一大片山地,成为小凉山彝族中有“红照”最早、占地最广的人家;他的土地是如此广阔,不仅附近的彝族向其租种土地,以至直至新中国成立前,阿鲁家的黑彝主子也向其租种土地。此后,他又用钱买官,得到了清朝的“顶子”和衣帽靴袍之类,因而就成了小凉山闻名的“阿鲁顶子”。自此以后,其子孙也就更加汉化,如身穿长袍,脚穿鞋袜,通汉话,学汉俗过年,等等,这就又使其子孙得到了“阿鲁汉呷”(即汉族阿鲁家)的称呼。阿鲁基祖本是黑彝余家的曲诺,阿鲁基祖的主子补余阿呷及其子孙,也就因为基祖的帮助,由一个平常的黑彝成为闻名于小凉山的富有大黑彝。与阿鲁基祖同时靠“红白旗事件”发家的,还有药山的黑彝余别雀,该人也在当时向土司买得了“红照”,占有了一大片土地,成为蒗蕖土司区西部最大的黑彝之一。余别雀别号“余二先生”,因其通晓汉语、懂得“汉理”而得名,可见其也趋于汉化。自“红白旗事件”后,少数彝族上层人物大发其财,彝族的势力也因之有所发展,随之有不少彝族又从四川大凉山迁入,如米、刘、胡诸姓黑彝也多是在此时前后迁来的。最早居于小凉山的余家地盘也更加扩展,如蒗蕖土司南部、西部地区的余家多是此后迁入的;今四川的介马、黑赤地、大白地等乡原来也不是小凉山彝族区,余家的曲诺甲子等家也在此后一、二十年间先后迁入,并逐渐成为该地的主要居民。这样,在“红白旗事件”之后,小凉山的彝族便逐渐成为蒗蕖土司辖区的主要的居民之一。土司为了便于统治,便在凉山彝族中进行了一些政治设置。如阿鲁基祖曾被委为千长,其子也曾被委为千长(因其兼管盐边李千长的地方,四川亦曾委其为千长,故基祖之子瓦达号称“双千长”);阿鲁基祖的主子补余阿呷兄弟,亦曾先后被委为千长;此外如清末时的余拉什亦曾被委为千长。千长之下又有所谓“课长”、“甲长”、“排首”之类,以当课长闻名者有大黑彝倮姆日达、补余瓦都(住药山)、补余维火(住井子沟)、倮倮果果(住桃子坪,原属蒗蕖地,今属四川)等人。以上是蒗蕖土司在小凉山的政治设置。

而永胜章土司在彝族中的政治设置略有不同，其在千长之下设“百长”，如蝉战河的甲子而都百长，万马厂的甲巴李百长等即是。这些彝族的千、百、课、甲长，多为凉山地区黑彝和曲诺中的有势力人物，据说他们都具有一定辖区，负责按“汉理”调解本区内的纠纷，遵照土司的规定指派“守哨人”，帮助土司和汉官查办案件和催交租税（据说蒗蕖土司衙内曾设有“汛官”，他每年要在彝族中收羊毛一斤）。这样，就在“红白旗事件”几十年后，凉山中不少按“汉理”办事的彝族中的头面人物，就进一步趋于汉化，如今副县长章思孝祖父甲子而都（章土司委百长）不但常着汉族衣冠，通晓汉语，而且还略通汉文，因其为章土司效劳颇勤，大得土司信任，认其为干子，并赐其姓章（其彝姓曰甲子，甲子支的彝人俱姓羊）。当光绪年间章土司被改流、穷途末路时，甲子而都曾遣其弟将章土司（章天锡）接往彝地（结果中途被捕未遂）。又如蒗蕖土司区的千长补余阿呷，亦熟知汉语、汉俗，他还有30余匹驮马，来往于永胜、丽江、鹤庆、盐源之间，从事商业活动。又如站河区李子磨乡的吉拉耳区，也曾因熟悉“汉理”、汉俗而被称为“吉拉先生”。

这些都证明，至清末，土司对凉山彝族的统治还是比较稳固的。这些凉山的千长、百长之类的人物虽然为土司所亲信，但他们的任职也不是终身的，如果他们不按土司的意旨行事，地方政府和土司不但可以将他们免职，甚至可以将他们处死。如清光绪末年曾被委为千长的余拉什（黑彝），当千长不过两年，即被土司指控，结果同另一黑彝一起，被解到永北厅（永胜）斩首。又如蒗蕖土司属区有名的大黑彝余撒撒和余诺衣，也是因抗拒土司的统治而被解到蒗蕖土司署斩首，其时间也在清末。应当说明的是，由于清末统治者贪赃枉法，也有包庇纵容黑彝奴隶主者，如清末出版的《云南杂志》中曾提到，一永北厅砍杀者被“黑彝所劫”，当地民团追捕抢劫者一人送官治罪，永北厅官长竟得了200两白银的贿赂，就将捕犯释放。

民国以后，特别是民国十几年以后，小凉山彝族的社会又有了巨大变化。民国元年，云南地方政府曾就永宁和蒗蕖土司地区设立永胜分县，委任了汉官，治今宁蒗县城（大村街），但其所辖多为坝区汉族，彝族所在的小凉山并未涉及。民国以后永胜县亦增设“彝务局”，清代在小凉山委的千长余海亭（黑彝）曾被吸收为该局的成员（仍住小凉山）。但小凉山彝族的社会形态并未因此而有多少变化。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地方军阀在川滇边界挑起的“雷云飞事件”发生后，小凉山彝族社会就有了一个重大转折。雷云飞原是川滇边界（华坪与四川盐边）间上棉花地的一个地霸，其地处于四川，而政治上受云南华坪县节制，在川滇军阀斗争中，他曾受云南军阀唐继尧之委（据说是“司令”），并给其枪支，让其进攻四川的盐边和盐源两县。后雷便纠集各种地方势力，攻下盐边县城，但却久攻盐源不下，并在之后不久被四川西昌县的一位“潘营长”用计谋刺死，其事也就至此结束。但在雷云飞进攻盐边和盐源时，曾以“司令”名义邀请小凉山的彝族参加，地近盐边的余家黑彝和曲诺见此良机，便踊跃而前，第一批去了700余人，第二批又陆续去了六七百人，合计共去了1000余人。到四川之后，由于盐源久攻不下以及雷云飞之死，这些无法节制的“打财喜”的人们便大掠起来，不但劫掠牛马金银和衣物，而且还劫掠了四五百汉族人民回到小凉山。自此以后，地处川滇边界间的小凉山附近的汉族地区的政治局面更为混乱，彝族奴隶主们也乘机肆无忌惮地对附近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劫掠起来；民国十四、十五年间，唐继尧的大理镇守使罗树昌反，罗曾约惯匪张结巴及中甸藏族骑兵至宁蒗，抢劫颇甚，亦曾与当地彝族发生战斗，时局十分混乱，最后其军队被唐的军队消灭于永胜一带。这种动荡的战乱环境，当然也给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提供了发展的条件。民国十六年（1927）时，唐

继尧的旧部张汝翼（滇东镇守使）和胡子嘉（滇南镇守使）等人联合反对龙云的统治，发生了战争，结果张、胡失败，退至宁蒗和四川盐源，并在盐源全军被歼。据说龙云此次曾亲自出马，坐镇华坪。老人们还记得，当龙云的军队带着被俘的张军回师时，整整在宁蒗过了7天。此时，龙云的儿子（龙纯武）驻军永胜，而小凉山的彝族早已闻知新任的云南统治者也是黑彝，于是黑彝们共出主意，在所属的曲诺中大肆摊派，收买了将近10 000个白锭，去永胜龙纯武处送礼。他们听说其酷爱跑马，又设法买到了十余匹好马进贡。龙纯武离开后，“安营长”（安纯三）镇守永胜，曾带小凉山著名的黑彝余海清、余国栋、余从龙、胡汉等人至昆明，拜见龙云。自此以后，黑彝们以为有了靠山，势焰更为嚣张，劫掠更加严重，蒗蕖土司对小凉山的统治也随之而削弱了，并转而攻击国民党的地方军队。1947年，丽江“工兵营”的三、四百人至小凉山搜刮（借铲烟之名搜刮白银与大烟），因与黑彝讨价还价而发生矛盾，结果双方发生冲突，刘家黑彝不顾张家黑彝的调解，联合部分余家黑彝，将工兵营赶出小凉山。此次战斗国民党军被打死30余人，丢枪50支。经过这一次战斗，过去一年到凉山搜刮一次的国民党地方军队，再也不敢到小凉山任意搜刮。自此以后，小凉山彝族基本上摆脱了土司的统治，彝族居住的小凉山也就成了附近各族人民心目中谈虎色变的地区。

近三、四十年来小凉山彝族的大肆劫掠，威胁到以汉族为主的附近各族劳动人民。近几百年来，不少汉、回等族人民迁居宁蒗地区，经过他们辛勤劳动，几乎所有可以种植水稻和苞谷的地方都被开垦出来，他们劳动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包括小凉山在内的许多角落，但经过近几十年来小凉山奴隶主的劫掠之后，他们在很多地方绝迹了。至今人们在小凉山的中心地区还可以见到许多的汉族和回族的坟冢，人们更可以在这里听到许多汉族的村名，如汉家厂、万马厂、磨坊沟、李子磨等，但是这里已经没有汉族，他们所开垦的水田已经荒废。有些汉族地主兼营的纸坊、磨坊也只遗下一些残迹了。据当地彝人说，蝉战河是彝人最早迁居的地区，那里的汉族已绝迹百年左右，但这次在此地却发现了光绪末年的汉人墓志，可见五、六十年前这里还有汉族聚居。近几十年来，处于小凉山之中的一些小河谷坝子的汉回族人民几乎绝迹了，他们有的逃到四川和永胜、华坪，有的则和宁蒗地区几个大坝子的人民并居起来。但即使是处在几个汉族聚居的坝子中，也难免被劫掠。如宁蒗地区有名的绵绵河谷区以产大米闻名，这里的老街子更是个热闹集市，甚至四川重庆和江西的商人们也来往于此地，但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时这里便遭到劫掠，集市被烧，人口几乎逃跑一空，数年间水田无人耕种。这样，汉族和纳西、普米等族人民为了生活，不得不按照小凉山彝族的规矩，向黑彝和富裕曲诺“投保”，每年每村交纳相当多的粮食和酒肉金银之类，请求彝人保护。另一方面因为投保也难免被掠为奴的命运，于是他们就不得不自动小村并大村，并在村子内筑起了围墙、碉堡，购置了一些火枪、步枪，以阻止奴隶主们的劫掠。但即原如此，坝子的汉族也难免被掠。如拉鹿河一个60余户的朱家堡子，近20年来被掠去的就有60余人；在20年前这个村子曾被围攻了3个多月，这里的人民下地生产也必须站岗放哨。至于土司辖区的纳西和普米等族，尤其是蒗蕖土司的百姓，也有不少人户被劫掠，据说蒗蕖土司辖的十余村普米族百姓中，有一半以上的村子也已迁徙并寨。由此可见，小凉山彝族奴隶制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是与对附近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的掠夺分不开的。

至于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彝族奴隶主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斗争也有相互依附。本来，小凉山彝族奴隶主的嚣张和地方军阀的割据有关，所以新中国成立前的反动政府也只有利用这一事实，对这里的各族人民进行搜刮，当然不会考虑各族人民的死活。但是反动统治者为